

我们也在变化。如何在美国研究中很好地处理这些关系,对研究单位和学者本人来说,都是个不小的挑战。

最后一点,对美研究要创造良好的研究氛围。刚才有些问题,大家展开了一些辩论,我觉得非常好,中国现在的辩论气氛越来越好。《环球时报》的“国际论坛”就是一个很好的辩论平台,通过辩论来提高学术研究水平,非常有益。

现在在中国对美研究的各个单位,如中国现代国

际关系研究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军方和相关的研究所等,在研究方法、研究领域上应该有不同的侧重。我们需要通才,但从研究来看更需要术业有专攻。希望我们大家彼此合作,形成合力,共同促进中国对美研究的发展。同样,将政府的研究力量和民间研究力量相结合,一定会有很大的相互促进。

总之,只有在这些方面都发展起来,中国才能称得上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世界性大国。○

对美国研究的几点浅见

王缉思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教授)

在我看来,“美国研究”同“美国问题研究”有某种微妙的区别。前者是把美国当作研究的对象国,涉及这个国家的方方面面,特别是它的内部特征和历史文化。“美国研究”的英文在美国是大写的 American Studies,其在美国学术界已经成为一门学科。后者则关注同美国相关的一些“问题”,更多反映动态和近期变化,其英文表述可以是 issues related to the United States。

大约是在1983年,我从北大去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参加一个关于如何发展美国研究的小型研讨会,第一次见到时任所长李慎之先生。印象颇深的是会上讨论了要不要建立“美国学”的问题。有学者提出,鉴于美国的独特性和重要性,对美国的研究应当成为一门单独的学科即“美国学”。那时正是中国学术界对西方(主要是美国)的“某某学”和“某某论”充满好奇以至憧憬的年代。

虽然“美国学”始终没有成气候,但“美国研究”却出现了光明前景。1987年,时任美国所副所长资中筠老师在《美国研究》创刊号上发表了题为《中国的美国研究》的长文。文章分四个时期勾画了从19世纪中叶开始的中国知识界对美国的探究。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第四个时期被称为“新时期”,并被认为是美国研究“蓬勃发展”时期。资老师说:“新的形势发展提出了把美国研究建设成为一门综

合性学科的客观要求。”资老师这篇文章,至今读起来仍有荡气回肠、发人深省之感。特别是她在结尾部分提到:“学术研究……归根结底是面对全社会,起开发民智的作用。同其他社会科学一样,(美国研究学者)如果说作‘智囊’,应该是作全民族的‘智囊’。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美国研究可以从根本上为中华民族的振兴、中国走向现代化作出一些贡献。”

回顾从那个年代以来中国的美国研究,“蓬勃发展”的局面是得以持续的,说“成就斐然”也并不为过。孙哲教授和他的弟子们为此出版了专著,张立平研究员等学者也对国内的美问题研究机构、人员、成果做了深入细致的梳理工作。成就部分,就不用我陈述了。

我想提出来思考的问题是:同改革开放后美国研究的领军学者李慎之、资中筠等人(也包括当年的许多中青年学者)所提出的长远设想相比,我们这个学科领域在方向、内容、方法等方面有什么变化?我感觉有几个现象值得注意。

首先,当年设想的建立“综合性学科”或曰“美国学”的客观要求现在不是十分明显,倒是出现了相反的趋势,即美国文学属于文学,美国社会问题属于社会学,美国经济、美国历史分属在各自的大学科里,如此等等,而不是从美国研究的树干里分出的枝

权。同时,这些不同学科分支在“美国研究”这里基本上不相互交汇。也许这是学科发展的自然现象,不必很在意。

其次,虽然美国在中国外交里仍被认为是“重中之重”,但随着中国对外交往的扩大和研究需要,其他国家和地区对中国的重要性相对上升,至少是需要更多关注,使很多原本研究美国的人不能不“分心”去关注其他国家和地区。这也是全球化的应有之义,就像外国的中国研究也越来越同亚洲研究密切结合一样。所以,当我在报刊上读到一些评论说研究其他问题的人不如研究美国的人那样受到重视,感到“冤枉”,很不以为然。当然,与此同时,非洲、中东、俄罗斯等地区国别研究也越来越涉猎到美国研究。这也是学科发展的自然现象。

第三,美国研究受到问题领域(issue areas)的强大冲击,许多精力不能不分流到诸如多边国际贸易、金融、气候变化、能源、环保、公共卫生等功能性问题(functional issues)上。同样,这一趋势也不可阻挡。

以上趋势结合起来,其结果是自称专门研究美国的学者的数目不但没有增加,反而似乎在减少。“美国研究”日益成为“美国问题研究”,发展成综合性学科的前景不复存在。专门从事美国研究的学者少了,“美国问题研究”成了谁都能说上几句的显学。

更为值得关注的是媒体、网络日益发达所造成的后果。国际问题学者“触媒”的利弊得失,我曾在一篇小文中论及。我认为,“学者对媒体的影响大大小于反向的影响。学者需要通过大众传媒和网络向公众发表观点,但其观点又受制于媒体的取舍,这是学者(特别是从事政策研究的学者)无法自我解脱的两难。从学者的角度说,在坚持正确观点和适应媒体需要之间寻找一个恰当的平衡点,似乎是最佳选择。学者角色、媒体角色和政策谋士角色的反差和频繁转换也会给学者带来难题。当一个重大事件或突发事件发生,学者角色的要求是客观冷静,沉一沉,想一想,在变化中看到连续性和历史长河的阶段性;时事评论员的角色要求则是迅速反应,突出事件的变化和重大意义,观点鲜明,慷慨激昂,吸引受众的注意;政策谋士角色的要求是既要有长远眼光,

更要捕捉新动向,提出新的行动建议。学者在报刊编辑的催促下,在镜头和话筒面前,很难抑制时事评论员式的冲动。”应当承认,对美国的长远、深入的学术研究,是网络时代的受害者。资老师希望美国研究能够“开发民智”,而现在的情况常常是被媒体和“民智”所开发。

还有一个问题是政策导向和课题导向。由于接受政府部门和社会科学规划部门支持与资助的项目,在美国研究领域一般不会是学术上专深、同中国关系不大的课题,而基本上是“美国问题研究”,因而对于美国地方政府、社区建设、社会思潮、移民政策等问题,以及许多需要大量接触实际进行调研的中观、微观问题,资源配置及研究能力就显得相当薄弱。《美国研究》近年来发表的关于“反文化”、堕胎、医疗改革的文章,都十分难能可贵。

资中筠老师1987年文章发表以来,国际形势、中美关系、中国政治与社会发生的深刻变化,对中国的美国研究带来的影响也是非常深远的,只不过人们不大注意罢了。1989年中美关系严重恶化之后,中国政界、知识精英和公众对美国的看法有很大转变,美国的形象基本上是负面的。资老师所提到的让美国研究为中华民族振兴做贡献的观念,更多地转化为关于如何应对美国压力的思考,包括如何为转变美国人的中国观而“做工作”的问题。关于美国政治经济制度的价值判断,同对美国外交的价值判断一起,成为某种不言自明的政治正确性问题。尤其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以来,很少再听到关于美国可以成为中国现代化的正面参照系的观点。从中国模式与美国模式的竞争、中美“两大国集团”(G2)、中美军事对抗,到中国最终将超越美国而成为世界“老大”的期待,都成为媒体的热门话题。

关于这些新的发展趋势,我们不必持“一代不如一代”的“九斤老太”心态,而是应当顺应时代变化。但是,作为学者,基本的学术规范应当坚持;作为研究者,既不可能做到“价值中立”,也不能以表面上的“国家利益”为唯一的是非标准。

关于今后的美国研究,我想强调两点:第一,美国研究要注重美国国内动向和国内问题,而非仅仅

关注美国在对外方面的作用和影响。第二,要有多学科视角,使得美国研究的相关领域相得益彰,例如

对当今现实问题的研究要吸取对美国社会文化的研究成果等。○

关于美国战略研究的若干思考

黄仁伟 (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研究员)

研究美国须先学习美国,尤其要学习美国的战略研究。美国战略研究的方法和特点,值得我们思考和借鉴。

首先,学习美国战略研究的时间长度和空间宽度。大国战略研究的时效范围应在10年以上,空间范围应是洲际或全球的。例如,罗斯福总统在二战期间的1942年,请历史学家特纳用美国历史的地域理论来设计未来的联合国框架,其基本要点的有效性至今仍未过时。再如,1959年美国加利福尼亚康纳公司的《亚洲报告》,对中美关系作出远期预测,其中提到台湾将由本地人掌权,中苏将爆发重大冲突,美国总统将秘密访华,中国大陆在联合国担任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而台湾则保留观察员资格等。这些判断后来大部分成为美国对华政策调整的依据。最近美国战略界正在展开的2025年以至2049年预测和模拟,其时空界域再度领先各国。

其次,学习美国战略研究的基础性和可靠性。1980年代里根和老布什时期提出的“超越遏制”战略,目标是促使苏联解体。实际上美国战略界早在80年代中期观察到苏联粮食严重缺乏,不得已动用黄金储备在世界市场上抢购小麦,加上阿富汗战争的困境,就预测到苏联经济将出现崩溃。当时美国战略界还判断,由于独立工会和天主教会的活动,波兰共产党迟早会垮台。这些判断都是来自于美国学者对苏东集团的长期基础研究,最后才形成具有可操作性的大战略。美国战略研究的另一个来源就是对科学技术发展趋势的深刻理解。从“高边疆”战略引发的“星球大战”计划,到导弹防御计划和“天网天军”等等,都成为美国军事战略乃至大战略的核心组成部分。可见,美国战略界和科学界结盟,使二者研究兼具准确性和可靠性的战略价值。

再次,要学习美国战略概念的创新性和连续性。美国战略界提出的一系列概念,其创新性远在各国之上,它们对于美国取得战略主动性和国际话语权功不可没。90年代初美国战略界提出的“文明冲突”和“软实力”等,对于冷战后和反恐战争的美国全球战略影响深远,而且还影响着我们这些非西方的研究人员。然而,其在政府层面的战略概念,却有很大的连续性。冷战时期美国各位总统的战略概念都是围绕着美苏对抗展开的;冷战后其各位总统的战略概念则是围绕着美国的全球主导地位。在对华政策上,从克林顿的“接触战略”到布什的“两面下注战略”,再到奥巴马的“战略再保障”,也体现着战略概念的连续性。有意思的是,美国学者的创新概念很难成为美国官方的主导概念。

最后,我们要避免美国战略研究的局限性。美国战略研究力量举世无双,但又何以一再失误?我想大致有以下几个原因:一是党派政治和利益集团影响战略思考的正确性,并且把美国最优秀的战略人才分割成好几块。二是意识形态因素的干扰,美国对问题的价值判断就是以反共产主义为前提。相当一部分美国战略界人士至今认为中国共产党迟早会垮台,根本不愿承认中国发展道路的正确性。三是美国学术界的“天条”如霸权稳定论、唯武器论和美国例外论等,构成其战略研究的禁区。正是因为美国对其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的迷信,他们在研究国内问题时往往失误较多。四是美国战略研究的个人色彩很浓,个人作用往往大于团队作用,基于情报分析的战略研究远远超过基于学科的基础研究。这两点又造成美国战略研究相信偶然因素超过必然因素。

基于以上思考,我们对美国的战略研究似乎应